

乌俄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历史书写评析*

桂欣

内容提要 1648年,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发动了一场反抗波兰贵族的哥萨克农民起义,在第聂伯河两岸的乌克兰地区建立了哥萨克自治政权。这是乌克兰历史长河中的里程碑事件。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历史学家从各自角度书写关于这场起义的不同记忆,体现了乌克兰民族独立意识与俄罗斯帝国思维的碰撞。20世纪5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将赫梅利尼茨基起义表述为“1648—1654年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1991年以后,俄罗斯历史学家大体上延续了苏联时期的官方阐述,强调乌克兰人民选择一条与俄国合并的道路。乌克兰历史学家则在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指导下,赋予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丰富的民族革命内涵。近年来,俄乌关系急剧恶化,“去俄罗斯化”成为乌克兰历史政策的核心思想。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书写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国际政治因素,这从历史角度反映出当代乌克兰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及社会“脱俄入欧”的主流趋势。

关键词 乌克兰 赫梅利尼茨基起义 历史书写 民族主义 俄罗斯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今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均隶属于波兰,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东南边疆。1648年,为反对波兰在乌克兰各省推行的政治、经济、宗教政策,扎波罗热盖特曼^①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Богдан Хмельницький)掀起一场反抗波兰贵族封建主的哥萨克农民战争,后该战争演变为有农民、市民及贵族参与的乌克兰民族大起义^②。同年4—5月^③,扎波罗热起义军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协助下击溃波兰军队,至1648年底已实际控制第聂伯河两岸广袤的乌克兰土地。次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在东正教神职人员的祝福下,隆重地进入基辅这座古老的罗斯城市,耶路撒冷大牧首派西授予其“罗斯王公”的称号^④。于是,这位盖特曼不再仅是一群哥萨克的首领,而是自视为基辅罗斯王公们的继承者,成为一位深受乌克兰民众爱戴的领袖和东正教信仰的真正捍卫者。

1649年8月,波兰国王扬二世·卡齐米日与赫梅利尼茨基就停战问题签署著名的《兹博罗夫协定》。该协定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哥萨克自治的具体范围、组织架构及国际地位,赋予盖特曼自主管辖基辅、布拉茨拉夫、切尔尼戈夫三省的权利,^⑤对哥萨克自治政权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义^⑥。扎波罗热哥萨克首次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划定明确边界线,乌克兰地区的波兰军政长官管理体系失去

* 本文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16—18世纪乌克兰哥萨克军队首领。

② 刘祖熙《波兰通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20页。

③ 本文出现的日期如无特殊标注均为俄历。

④ Ю. Мицик, Джерела з історії Національно-визвольної війни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народу 1648 – 1658 рр. том 1: 1648 – 1649 рр., К.: НАН України. Інститут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археографії та джерелознавства ім. М. С. Грушевського, 2012. с. 193 – 195.

⑤ І. Крипякевич, І. Бутич, Універсали Богдана Хмельницького. 1648 – 1657, К.: Альтернативи, 1998. с. 52 – 56.

⑥ Т. Г. Таирова-Яковлева, Генези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и в Украине на примере договоров с польшей и Россией, Россия – Украина: история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7. с. 51.

实际意义,哥萨克的军团、百人长等制度逐渐确立起来。^①哥萨克成为17世纪中叶乌克兰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主导力量。然而,1650—1653年,鉴于盟友克里米亚汗国多次临阵倒戈,初生的哥萨克政权面对强大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亟需获得奥斯曼帝国或俄国的实际支持。1654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在佩列亚斯拉夫城召开拉达^②大会,公开向宗教信仰一致、同为东正教徒的莫斯科沙皇宣誓效忠。同年3月,俄国政府正式批准哥萨克使团的请愿书^③,将乌克兰地区以自治形式纳入俄国版图。就这样,自基辅罗斯衰亡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历史再次交织在一起,成为俄乌关系发展的新起点,对17世纪下半叶的中东欧局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文通过梳理帝俄时期、苏联时期、当代乌克兰和俄罗斯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研究成果,分析不同历史学家视角下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探究乌克兰如何建构民族革命的历史记忆,阐明乌克兰民族主义史学背景下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历史书写,为深化我国乌克兰问题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一、帝俄时期: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与乌克兰民族政治

19世纪上半叶,俄国正值文化繁荣期,著名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称之为一个外有政治奴役、内有思想解放的惊人时代。^④在此背景下,一部分乌克兰知识分子主张泛斯拉夫主义,希望斯拉夫民族统一。当时,基辅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作为秘密政治团体基里尔—梅福季兄弟会^⑤的创始人之一,因企图利用兄弟会推行“亲乌克兰主义”^⑥、恢复哥萨克盖特曼政权等罪名被沙皇尼古拉一世逮捕、监禁、流放。尽管“罗斯重新合并”观点与俄国政府宣扬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无甚出入,但科斯托马罗夫的“南俄民族主义史观”在沙皇时期形同禁学,持该观点的历史学家遭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迫害。19世纪中叶,沙皇政府解除了基里尔—梅福季兄弟会成员从事教学、发表作品的禁令,同时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地区开启研究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学术先河。1857年,科斯托马罗夫发表首部专著《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着重肯定盖特曼对“罗斯重新合并”做出的贡献,推崇乌克兰哥萨克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他以整个斯拉夫世界为视角,阐述了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对斯拉夫民族内部俄波优势地位互换的重要意义。^⑦需要强调的是,有别于俄国史学大师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书中的“小俄罗斯”称谓^⑧,科斯托马罗夫在历史书写中更倾向于将乌克兰视为“南俄罗斯”,这在1861年发表的《两个俄罗斯民族》^⑨一文中得到了充分阐释。

① Я. Федорук, *Зовнішньополітична діяльність Богдана Хмельницького і формування його політичної програми (1648 – серпень 1649 рр.)*, Львів: АН України. Інститут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археографії. Львівське відділення, 1993. с. 61.

② 拉达意为“群众大会”“人民会议”。

③ 1654年3月,哥萨克使团携请愿书前往莫斯科,与沙皇派出的贵族代表达成一份《三月条款》,即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根据该协议,俄国沙皇同意接受哥萨克自治政权的臣服,允许哥萨克自主选举盖特曼,保留扎波罗热哥萨克原有的组织制度及最高立法权、独立司法权、财政税收权等。

④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杨烨、卿文辉、王毅译《俄罗斯史》(第八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0页。

⑤ 1845年末,尼古拉·古拉克、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瓦西里·别洛泽尔斯基等乌克兰平民知识分子在基辅创建基里尔—梅福季兄弟会,旨在维护斯拉夫民族独立,唤醒民族的自我意识,促进基督教会和解,建立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联邦制斯拉夫民主共和国。科斯托马罗夫等人认为,乌克兰人民从哥萨克那里继承了热爱自由、追求民主的特性,在共和国创建过程中注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斯拉夫民主共和国不仅覆盖当时的俄罗斯帝国,还囊括捷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规定境内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均享有选举权和民主自由。

⑥ 19世纪以保护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化和文学为宗旨的乌克兰社会文化运动。

⑦ Н. И. Костомаров, *Богдан Хмельницкий. том 1*, СПб.: изд. Д. Е. Кожанчикова, 1859, с. 5–6.

⑧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左少兴等译《俄国史教程》(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0—135页。

⑨ Н. И. Костомаров, “Две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ости”, *Основа*, vol. 3, 1861.

然而,不同于科斯托马罗夫的斯拉夫主义叙事方式,以著名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为代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强烈谴责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及其后果,认为该事件给乌克兰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19世纪中叶,塔拉斯·舍甫琴科创作了大量乌克兰民族诗歌,对乌克兰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誉为“乌克兰的普希金”、乌克兰民族主义先驱。他指出,与俄国的斗争一直占据着乌克兰人民的历史主位,莫斯科是乌克兰民族自古以来的最大敌人。在这一史学思想的指导下,乌克兰的哥萨克政治人物可分为正邪两类,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恰恰属于邪恶派。舍甫琴科“比某些历史学家更清楚地知道,乌克兰的一切苦难均源于这位盖特曼与俄国签订的那一不幸协定(即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笔者注)”^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直至19世纪末,赫梅利尼茨基依然被当作俄罗斯国家统一的支持者形象而得到广泛宣传。例如,1888年7月11日,基辅的索非亚广场上矗立起赫梅利尼茨基纪念雕像,基座前方写着“沐浴在东方东正教沙皇的光辉下”,左边刻着“1654—1888”,右边则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献给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20世纪初,乌克兰基辅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博格丹派”和“马泽帕派”的政治讨论。^②在官方思想的指导下,赫梅利尼茨基致力于俄罗斯国家重新统一的历史形象得到极大升华。乌克兰著名社会活动家、“黑色百人团”创始者之一的瓦西里·舒尔金公开表示,“我们称那些背叛俄国的乌克兰人为‘马泽帕派’,与之相对的则为‘博格丹派’。基辅市民绝大多数属于‘博格丹派’,是赫梅利尼茨基统一政策的继承者。我们深知,莫斯科如若没有基辅,就不可能成为俄罗斯,只会是莫斯科公国。基辅如若没有莫斯科,就不可能成为基辅罗斯,充其量仅为奥地利的延续”^③。1911年,“基辅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俱乐部”领导人之一的阿纳托利·萨文科在《基辅人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观点与舒尔金略有差别。萨文科认为,“‘亲乌克兰主义者’分为两类。一类维护俄罗斯民族统一、民族文化统一的理念,进而支持政治统一,这些‘亲乌克兰主义者’也属于‘博格丹派’。另一类追求小俄罗斯的民族文化独立,进而拥护乌克兰民族的政治独立,这些‘亲乌克兰主义者’属于‘马泽帕派’”^④。显然,赫梅利尼茨基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眼中“忠于莫斯科”“俄罗斯统一”的代名词。

1910年代,关于“博格丹派”内涵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乌克兰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叶夫根·奇卡连科反对舒尔金和萨文科的观点,认为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意在捍卫乌克兰自治。1912年1月,奇卡连科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乌克兰自治主义者才是‘博格丹派’。从乌克兰意识复兴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没有比自治更进一步。从基里尔—梅福季协会到格鲁舍夫斯基,我们一直倡导自治主义,而非分裂主义,与马泽帕截然不同。”^⑤同年,乌克兰著名历史学家、乌克兰运动领袖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在基辅《文学与科学公报》发表《“马泽帕主义”与“博格丹主义”》一文。不久,这篇文章被西蒙·彼得留拉主编的莫斯科杂志《乌克兰生活》转载,改名为《新民族主义者的旗帜》。格鲁舍夫斯基在该文中试图证明哥萨克盖特曼既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宣扬的“统一

① А. Трємбїцький, Л. Іванович, 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про національного провідника Богдана Хмельницького, *Нові дослідження пам'яток козацької доби в Україні: Збірник наукових праць*, вип. 22, ч. 2, К., 2013, с. 117–118.

② 伊万·马泽帕是彼得大帝时代的乌克兰盖特曼,于1709年北方战争中投诚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1910年前后,“基辅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俱乐部”以《基辅人报》为宣传媒介,鼓吹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起义过程中的亲俄思想,将伊万·马泽帕视为俄罗斯帝国领土完整的主要威胁。1916年,俄国内务部警察局公布了一份关于1914—1916年乌克兰运动的报告,简要概述了“小俄罗斯人民的分离主义革命运动”,谈到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马泽帕主义”的态度。

③ А. А. Чемакин,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ст》 ил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автономист»?* Два образа Богдана Хмельницького, <https://ukraina.ru/history/20190225/1022806360.html>

④ А. А. Чемакин,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ст》 ил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автономист»?* Два образа Богдана Хмельницького, <https://ukraina.ru/history/20190225/1022806360.html>

⑤ А. А. Чемакин,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ст》 ил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автономист»?* Два образа Богдана Хмельницького, <https://ukraina.ru/history/20190225/1022806360.html>

者”也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批判的“叛徒”。他写道“所有熟悉乌克兰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赫梅利尼茨基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自治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乌克兰国家理念的践行者，对与俄国中央集权的首次实质性冲突感到义愤填膺，决定坚决贯彻反莫斯科的外交路线。”“赫梅利尼茨基深知，沙皇政府反对乌克兰自治，因此不断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最终敲定与瑞典结盟的想法。最近，基辅考古委员会公布的文献充分揭示了扎波罗热外交政策的演变，展示了哥萨克如何协调与瑞典的联盟和俄国的庇护。鉴于瑞典与波兰持续对抗以及俄国和波兰实现和解，赫梅利尼茨基徘徊于瑞典与俄国之间的左右结盟政策出现矛盾。这位盖特曼紧紧抓住与瑞典的外交联系，准备与莫斯科决裂。”^①可见，随着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赫梅利尼茨基在历史书写中又俨然成为谋求“乌克兰自治”的先行者。

二、苏联时期：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与俄乌民族统一

乌克兰政治家对“博格丹派”这一身份标签的争夺一直延续至俄国大革命时期。1917年4月，乌克兰民族代表大会授权中央拉达^②推进乌克兰自治事业。在此背景下，赫梅利尼茨基被广泛宣扬为“乌克兰自治主义者”。然而，随着俄国内战的发展，乌克兰运动从“自治”口号转向要求“独立”。1917年11月，中央拉达宣告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格鲁舍夫斯基等自治主义者基本转向“马泽帕派”，赫梅利尼茨基的形象也随之从“乌克兰自治”的先行者过渡为“乌克兰国家”的建设者。1920年，乌克兰著名历史学家、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之一维亚切斯拉夫·利平斯基在《转折中的乌克兰：1657—1659》^③一书中指出，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是一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乌克兰大革命”，利平斯基从创建独立国家的角度分析这场革命进程，深入探讨赫梅利尼茨基关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强调哥萨克对乌克兰革命、民族觉醒的决定性作用。

1922年底，乌克兰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24年3月，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获得苏联当局同意，从国外返回乌克兰基辅。此前不久，他已当选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将领导该机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1931年，格鲁舍夫斯基完成《乌克兰—罗斯史（第九卷）》^④，详细论述了1650—1657年赫梅利尼茨基时代的乌克兰历史。多卷本专著《乌克兰—罗斯史》是乌克兰史学领域的奠基性成果，至今仍未失去其“百科全书”式的意义，对研究乌克兰民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格鲁舍夫斯基认为，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堪称乌克兰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是16—18世纪欧洲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扎波罗热盖特曼建立的哥萨克自治政权事实上获得了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可称之为“乌克兰国”。1929年，格鲁舍夫斯基正式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然而，在1928年12月至1929年1月召开的首届全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会议上，苏联科学院院士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指责包括格鲁舍夫斯基在内的部分乌克兰历史学家为“民族沙文主义者”，将其史学观点定性为“科学民族主义”。^⑤1931年3月，格鲁舍夫斯基在前往列宁格勒参加会议的途中被捕。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苏联学界普遍采纳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资产阶级哥萨克革命”解释，特别将1648—1649年乌克兰历史视为“民主的哥萨克农民革命”。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至40年代上半期，弗拉基米尔·戈洛布茨基、康斯坦丁·

① М. С. Грушевский, 《Мазепинство》 і 《богданівство》, Твори: у 50 т. том 2, Львів: Світ, 2005, с. 202.

② 1917年3月，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基辅成立中央拉达，初期主张乌克兰实行广泛自治。

③ В. К. Липинский, *Україна на переломі: 1657 – 1659*, Відень, 1920.

④ М. С. Грушевский,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Руси. Том 9, книга 1*, Київ, 1928;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Руси. Том 9, книга 2*, Київ, 1931.

⑤ 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Всероссий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историков-марксистов, Историк-марксист*, vol. 11, 1929.

奥西波夫、米科拉·彼得罗夫斯基等历史学家强调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中的民族解放性质，将其表述为“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试图揭示哥萨克自治政权的社会经济政策。乌克兰科学院通讯院士彼得罗夫斯基在《乌克兰人民反抗波兰贵族压迫暨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的解放战争（1648—1654）》^①一书中认为，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具有“典型的农民战争特点”，而俄乌两大兄弟民族长期且深入的联系是乌克兰并入俄罗斯的前提条件之一。扎波罗热盖特曼于1648—1654年建立了“乌克兰哥萨克国”。对此，历史学家巴拉博伊撰文道，彼得罗夫斯基教授的观点整体上是一种折中主义，既不像格鲁舍夫斯基那样有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色彩，也不完全是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②

1947年，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倡议下，乌克兰科学院乌克兰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工作者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不久，乌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乌克兰科学院乌克兰历史研究所政治错误与工作不合规的决议。自此，“俄乌重新合并”在历史书写中成为17世纪中叶乌克兰人民的不二选择。相较于帝俄的“小俄罗斯”定义，苏联官方承认乌克兰为俄罗斯的“兄弟民族”。1948年，根据乌共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乌克兰科学院乌克兰历史研究所出版了《乌克兰历史简明教程》。乌克兰历史研究所所长谢尔盖·别洛索夫等学者认为，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是一场由农民阶级主导的解放战争。“起义期间，乌克兰人民请求并入俄国，清楚地表达了早就想与俄罗斯兄弟民族统一的愿望。赫梅利尼茨基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了解并入俄国才是乌克兰唯一正确的道路，带领乌克兰人民奔向这一目标。”^③1953年，苏联科学院出版了三卷本《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再次统一》^④文献集，首度披露了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大量一手史料，如沙皇与赫梅利尼茨基的来往信件、莫斯科和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外交文书、俄国边境军政长官的官方报告等。这些资料证实了起义期间乌克兰民众迁往俄国境内定居，反映了乌克兰人民同俄罗斯人民永远团聚的热切愿望。

1953年底，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一项关于庆祝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三百周年的决议。次年1月12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真理报》发表《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三百周年（1654—1954年）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一文，对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给予官方评价。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三百年前，即1654年1月，乌克兰人民在佩列亚斯拉夫拉达会议上表达了希望俄乌重新合并的强烈愿望。极具历史意义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结束了热爱自由的乌克兰民族抵御外来压迫者的长期斗争，使其与俄罗斯民族重新团聚在统一国家内。”“重新合并对于俄乌这两个伟大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十分重要。正如列宁所说，他们‘在语言、聚居地、性格及历史方面十分相近’。乌克兰人民通过将自己的命运同兄弟民族俄罗斯永远捆绑在一起，避免了外来者的奴役，确保了民族发展的可能性。”“1648—1654年民族解放战争是乌克兰人民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农民在这场战争中起了主导性、决定性作用，他们奋起反抗波兰、乌克兰封建农奴主的社会压迫及土耳其苏丹的侵略威胁。”“赫梅利尼茨基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及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者，其历史功勋在于表达了乌克兰人民希望与俄罗斯人民紧密相连

^① М. Н. Петровський, *Визвольна війна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народу проти гніту шляхетської Польщі і приєднання України до Росії (1648 – 1654)*, Київ: Видавництво Академії наук УРСР, 1940.

^② Л. Барабой, Петровський М. Н. проф. *Визвольна війна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народу проти гніту шляхетської Польщі і приєднання України до Росії (1648 – 1654)*. Нариси з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Вип. IV. , *Історик-марксист*, vol. 7, 1940.

^③ С. Н. Белоусов, И. Д. Бойко, К. Г. Гуслистый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УССР, 1948, с. 122.

^④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е Украины с Россией.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трех томах*,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53.

的古老诉求和愿望。他正确地判断了自己的任务和计划,坚定地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认为乌克兰民族只有与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统一才有机会获得拯救。”^①

《提纲》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叙事方式成为苏联史学界对此事件的唯一解释范式。1954年4月,乌克兰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分别在基辅、莫斯科举行纪念俄乌合并三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同年6月出版的《苏联科学院通报》刊登了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代所长、苏联国家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安娜·潘克拉托娃院士撰写的《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的历史意义》一文。潘克拉托娃院士基本重复了《提纲》的主要内容,并指出“赫梅利尼茨基之所以发动大起义,恰恰是基于对正义及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需要的深刻信念”^②。总之,无论是帝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总是与乌克兰的民族诉求、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

三、苏联解体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与乌克兰民族革命

1991年苏联解体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作为乌克兰哥萨克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成为各学术论坛的讨论焦点,但历史学家们关于赫梅利尼茨基的战略意图和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性质尚存在意见分歧。俄罗斯历史学家大体上延续了苏联时期的官方阐述,强调赫梅利尼茨基选择了一条与俄国合并的道路。乌克兰历史学家则摒弃苏联传统的分析方法与治史思路,不再宣扬“东斯拉夫兄弟民族的重新统一”抑或是“并入俄国才是乌克兰唯一正确的道路”,而是继承利平斯基和格鲁舍夫斯基的民族主义思想,赋予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丰富的民族革命内涵。

在历史书写中,多数俄罗斯历史学家坚持继续使用“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这一术语,认为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促成了“俄乌重新统一”,将赫梅利尼茨基描绘成一位功绩卓著的亲俄政治家,认为与俄国合并完全符合乌克兰民族利益。对此,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根纳季·萨宁指出,赫梅利尼茨基自1648年秋就一直坚持不懈地派遣使者前往莫斯科,请求沙皇接受哥萨克政权的臣服,将乌克兰地区纳入俄国版图。“这位盖特曼清晰且合理地认识到,乌克兰只有与俄国统一才能保全哥萨克自治政权。”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拉达会议后,俄乌制定了统一的外交路线,努力巩固双方合并这一成果。《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未曾限制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外交自由,赫梅利尼茨基统治末期的对外政策也不存在分离主义倾向。因为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均均为基辅罗斯的后裔,他们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相似的语言文化,共同的历史过去,统一的自我认同。^③另外,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斯拉夫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鲍里斯·弗洛里亚认为,哥萨克政权从法律层面来说是以自治形式成为俄国的一部分。苏联官方史学将此定义为“俄乌两个兄弟民族的重新统一”并不恰当。《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实际上促成了“古罗斯土地的重新统一”。^④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俄国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境内的东斯拉夫人之间存在一定的族裔分化,但作为民族整体必须统一的想法仍是主流。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期间,波兰立陶宛联邦境内的东斯拉夫人创建了哥萨克政权,其目标是要将所有罗斯人从波兰人的剥削中解放出来。所以,根据1654

① Тезисы о 300-летию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я Украины с Россией (1654 – 1954 гг.), *Правда*, Января 1954 г., vol. 12.

② А. М. Панкрато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я Украины с Россией, *Вестник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vol. 6, 1954, с. 15.

③ Г. А. Санин, Положение Украины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 века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Смоленск и белорусские земли в годы русско-польской войны 1654 – 1667 гг.,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от истоков до 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 Очерк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2011, с. 160 – 207.

④ Б. Н. Флоря, Спо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укра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и середине XVII в., *Белоруссия и Украина: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Ежегодник 2003*, М.: Наука, 2003, с. 36 – 37.

年《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扎波罗热哥萨克治下的乌克兰土地并入俄国,这正是早先疆域四分五裂的基辅罗斯的重新合并,是古老罗斯的重新统一。^①

2004年,即《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缔结350周年之际,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院士彼得·托洛奇科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该协议是乌克兰人民及其政治、宗教精英的历史性选择。托洛奇科指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中的主体双方具有不平等地位。扎波罗热哥萨克作为沙皇君主的臣民,是以政治自治的身份成为俄国的一部分,在莫斯科的帮助下摆脱波兰贵族封建主的奴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已遭到乌克兰主流学界的否定。受东欧剧变后新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乌克兰历史学家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书写呈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就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目的、结果、意义、影响等提出不同看法。

1993—2001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乌克兰历史研究所联合切尔卡瑟国立大学第聂伯河历史研究中心先后出版多本《乌克兰哥萨克国:历史发展起源与路径》^②学术论文集。历史学家们深入探究了17世纪中叶乌克兰的政治精英、国家建设、政教互动、国际地位及俄乌关系等问题,特别是在乌克兰“哥萨克国”的建国理念、发展脉络、宗教文化与政治外交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1995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乌克兰历史研究所发表《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时代(纪念伟大盖特曼诞辰400周年)》^③学术论文集。该论文集涵盖了赫梅利尼茨基在“乌克兰国家建设过程中”的政治、军事活动,分析了这位盖特曼的国家理念与战略目标,展现了“‘哥萨克国’创建者”的光辉形象。此外,2012—2015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乌克兰古文献学与史料学研究所连续发表四卷本《1648—1658年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史文献集》^④。不同于俄文文献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再次统一》,这份乌克兰档案汇编翻译、收集了波兰国家图书馆、波兰历史文献中央档案馆、波兰科学院图书馆、乌克兰国家图书馆、乌克兰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的大量原始资料。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教授、文献编委会主席尤里·米齐克在前言中写道,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即1648—1658年民族革命是乌克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得到了同时代编年史家及后世历史学家的关注和研究。然而,由于帝俄时期的报刊检查制度、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禁锢,对该问题的探索缺乏全面、翔实的一手史料。编委会希望,这套四卷本文献集的出版能够开启民族解放战争研究的新阶段。^⑤

2009年,在俄罗斯政府的资助下,俄罗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达尼洛夫与亚历山大·菲利波夫主编的《新独立国家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关于俄罗斯及后苏联国家民族历史的总体叙述》一书问世。该书收集并分析了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等12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187本历史教科书。结果表明,除了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其余国家均竭力向年轻一代传授民族主义的叙

① Б. Н. Флоря, О некотор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восточных славян в эпоху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 раннего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Россия – Украина: история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7, с. 19.

② Українська козацька держава: витоки та шляхи історичного розвитку (Матеріали Третіх 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их історичних читань), Київ-Черкаси: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У, 1993; Українська козацька держава: витоки та шляхи історичного розвитку (Матеріали Четвертих 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их історичних читань), Київ-Черкаси: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У, 1994; Українська козацька держава: витоки та шляхи історичного розвитку (Матеріали П'ятих 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их історичних читань), Київ-Черкаси: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У, 1995; Українська козацька держава: витоки та шляхи історичного розвитку (Матеріали Шостих 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их історичних читань), Київ-Черкаси: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У, 1996; Українська козацька держава: витоки та шляхи історичного розвитку (Матеріали Восьмих 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их історичних читань), Київ-Черкаси: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У, 2001.

③ Доба Богдана Хмельницького (до 400-річчя від дня народження великого гетьмана), К.: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У, 1995.

④ Джерела з історії Національно-визвольної війни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народу 1648 – 1658 рр. том 1 – 4, К., 2012 – 2015.

⑤ Ю. А. Мищик, *Джерела з історії Національно-визвольної війни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народу 1648 – 1658 рр. том 1: 1648 – 1649 рр.*, с. 5.

事方式,大力宣扬本民族祖先的崇高文化使命,将与俄罗斯的接触和交往视为民族灾难的根源。^①在乌克兰历史教科书中,1648年爆发的哥萨克大起义属于全欧洲进程、三十年战争、英国革命的范围之中。赫梅利尼茨基竭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力求“统一乌克兰地区的所有人民”。哥萨克自治政权被冠予“乌克兰哥萨克国”或“盖特曼国”之名,扎波罗热哥萨克成为这一时期乌克兰民族的中流砥柱。教科书编写者否认沙皇曾为哥萨克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倾向于将俄国描述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盟友,弱化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拉达大会的意义,强调起义之初莫斯科对扎波罗热的敌视态度。在历史书写中,他们一般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称作《乌克兰—莫斯科条约》,认为该条约虽促成“俄乌两国的军事政治同盟”,但具有强制性、临时性等特点,不过还是巩固了“乌克兰的独立地位”,从法律上确保了“沙皇对扎波罗热军团独立性的承认”,赋予乌克兰地区一个合法国家的身份,使“哥萨克国”得以作为独立主体参与国际政治。^②亚历山大·达尼洛夫和亚历山大·菲利波夫就乌克兰学者观点予以驳斥,认为这完全是当代乌克兰的史学神话,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乌克兰哥萨克国”“哥萨克统领国”等术语。^③事实上,双方观点均受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看法莫衷一是。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院士瓦列里·斯莫利和瓦列里·斯捷潘科夫是研究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领军人物。他们认为,不论从规模、形式来看,还是从经济文化领域来看,赫梅利尼茨基起义都堪称一场乌克兰民族革命。波兰史学中的“哥萨克起义”、“哥萨克战争”、“农民战争”等术语并不适用于17世纪乌克兰历史,普遍使用的“哥萨克革命”也不准确。这些术语具有片面性,仅将起义本质归结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内部的社会冲突,忽视了乌克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独立国家的意义,未体现出乌克兰国家的形成及其社会政治关系、社会经济模式的转变。当时,赫梅利尼茨基起义蔓延至“整个罗斯大地”,演变为一场欧洲无与伦比的以民族解放、社会变革、宗教文化为显著标志的斗争,它致力于消除乌克兰民族土地上的波兰政治制度和经济生产关系,在“哥萨克国”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实现更加进步的公共生活组织方式。^④这场乌克兰民族革命不仅是为了摆脱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桎梏,也是为了免受俄国、克里米亚汗国、奥斯曼土耳其的侵略,捍卫“乌克兰哥萨克国”的独立地位。在此过程中,哥萨克作为领导阶层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引导乌克兰地区的农民起义示威,号召广大群众依照基辅罗斯的传统建立独立国家。哥萨克成为年轻“乌克兰国”的军队主力、政治精英、社会基础,凭借土地所有者身份抵制封建制的社会经济形态。毫无疑问,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哥萨克”一词在乌克兰民族的公共意识中同国家建设、政治现象联系在一起,涌现出“乌克兰哥萨克”之类的术语。^⑤

斯莫利和斯捷潘科夫在合作著书的同时,还分别发表大量论文。^⑥这两位历史学家奠定了乌

①②③ А. А. Данилов, А. В. Филиппов, *Освещение 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и народо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 в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ах истории новых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луб, 2009, с. 5–12, 47–53, 49.

④⑤ В. А. Смолій, В. С. Степанков, *Українська національна революція XVII ст. (1648–1676 рр.)*, Київ: видавничий дім «Києво-Могилянська академія», 2009, с. 35–36, 38, 40, 41.

⑥ В. А. Смолій, “Українська козацька держава”, *Український історичний журнал*, vol. 4, 1991; В. С. Степанков, *Українська революція в контексті європейського революційного руху XVI–XVII ст. (спроба порівняльно-історичного аналізу)*, *Українська козацька держава: витоки та шляхи історичного розвитку (Матеріали Шостих 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их історичних читань)*, Київ-Черкаси: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У, 1996; В. А. Смолій, В. С. Степанков,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політичний проект XVII ст.: становлення національного інституту влади*, К.: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2014; В. А. Смолій, В. С. Степанков, *Феномен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національної революції XVII ст.: компаративні та евристичні проєкції*, К.: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2019; В. С. Степанков, *Роль воєнного фактору 1648 – першої половини 1652 р. у формуванні нового соціуму в Українській державі, I Міжнародна наукова конференція “Війна і Соціум у середньовічній та ранньомодерній історії Центрально-Східної Європи”*: Програма та тези доповідей, К.: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2020.

克兰史学界关于17世纪民族革命的研究基础,倾向于将乌克兰建国史追溯至赫梅利尼茨基时代的“哥萨克统领国”,将1648年爆发的哥萨克起义与16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尼德兰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加泰罗尼亚起义、那不勒斯起义、18世纪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除了探究“哥萨克统领国”,乌克兰学者还重点研究17世纪的哥萨克政治精英及其国家理念。赫梅利尼茨基与克里米亚汗国、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关系,如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乌克兰古文献学与史料学研究所雅罗斯拉夫·费多鲁克副研究员的《土耳其、克里米亚与赫梅利尼茨基的政策:起义初的几个月》^①、维克托·布列胡年科教授的《克里米亚汗国与早期乌克兰国家的国际承认、扎波罗热基层军团的主体化问题》^②、乌克兰历史研究所塔拉斯·丘赫利布研究员的《扎波罗热军团官方话语中的“乌克兰”与“乌克兰的”概念(1649—1659年)》^③等。他们一反苏联官方和俄罗斯学者的阐述,认为赫梅利尼茨基早已萌生了独立建国的理念,并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如今,1648年爆发的哥萨克大起义已成为乌克兰书写民族记忆、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议题。

四、当代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与乌克兰民族史学

当代乌克兰历史科学深受国家转型以来的政治危机和文化认同影响。为了摆脱苏联时期共同的历史文化空间,乌克兰精英阶层努力构建一套“民族化”的历史叙事。这一过程本身也意味着政治主权和文化独立。^④在此背景下,历史书写与政治现实紧密相连,“去俄罗斯化”成为乌克兰历史政策的核心思想。

21世纪初,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为代表的亲西方政府着重渲染乌克兰民族的悲情色彩,将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宣传为苏联的种族灭绝计划,将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宣传为“乌克兰英雄”,在历史记忆问题上与波兰、俄罗斯等国均有冲突。正如彼得·托洛奇科院士所提醒的,那些“对乌克兰历史的全新阐述”占据着当代史学的主导地位。部分历史学家试图证明乌克兰曾遭受帝俄和苏联的殖民统治,强调乌克兰与俄罗斯这两个东斯拉夫民族之间无任何血缘联系,完全忽视乌克兰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同一性,纯粹为政治目的创造民族神话。^⑤

在“脱俄入欧”政策的指导下,历史上的乌克兰不再仅是俄国的一部分,同样作为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王国、奥匈帝国、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被加以分析和研究。10—20世纪的乌克兰历史可依次分为基辅罗斯、加利奇—沃伦公国、波兰立陶宛联邦、“哥萨克统领国”、俄国、奥匈帝国、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多个时期。^⑥其中,“哥萨克统领国”凸显出哥萨克在乌克兰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所建立的哥萨克自治政权开创了一段承前启后的时代。与此同时,乌克兰历史学家却质疑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拉达会议的合法性,理所当然地将

① Я. Федорук, Туреччина, Крим і політика Богдана Хмельницького: перші місяці повстання, *Українська козацька держава: витоки та шляхи історичного розвитку (Матеріали Третіх 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их історичних читань)*, Київ-Черкаси: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У, 1993.

② В. А. Брехуненко, “Кримський ханат і проблема міжнародного визнання Ранньомодерної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держави та субективізації Війська Запорозького Низового”, *Проблеми історії країн Центральної та Східної Європи*, vol. 15, 2016.

③ Т. В. Чухліб, “Поняття «Україна» та «Українний» в офіційному дискурсі Війська Запорозького (1649 – 1659 рр.)”, *Україн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Східній Європі*, vol. 15, 2015.

④ 周国长《“脱俄入欧”:独立后乌克兰历史政策的变化(1991—2013)》,载《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4期。

⑤ П. П. Толочко, *Україн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Западом: историко-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Пб.: СПбГУП, 2018, с. 25 – 43.

⑥ Ю. А. Мищик, О. Г. Бажан, В. С. Власо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Київ: видавничий дім «Києво-Могилянська академія», 2008, с. 98 – 120.

伊万·马泽帕评价为反抗俄罗斯帝国殖民政策的伟大盖特曼,认为18世纪的莫斯科沙皇是一步步摧毁“哥萨克统领国”的罪魁祸首。例如,1709年波尔塔瓦战役后,彼得一世将原本自治的乌克兰变成典型的“莫斯科郊区”。^①176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废除哥萨克自治制度的宣言,将乌克兰变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普通行省。^②

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史学肩负着重要的政治任务。历史学家借分析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之名,回顾了历史上的“哥萨克国”与俄乌关系,为当代乌克兰及俄乌两国关系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1996年,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院士瓦列里·斯莫利教授发表了《再论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及其历史教训》一文。作者高度赞扬赫梅利尼茨基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创建、新社会经济关系的建立、乌克兰国家精神的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反驳了某些公共媒体、政治人物、专家学者对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拉达会议决定的批评。瓦列里·斯莫利认为,那些针对《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批评均非学术性讨论,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哥萨克自治政权与俄国的和解符合17世纪中叶的历史实际。盖特曼设法以协议的形式与莫斯科建立政治关系,确定双方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可惜的是,阿列克谢·彼得一世等罗曼诺夫王朝沙皇对“哥萨克国”的自治权益加以逐步、系统的限制,利用乌克兰的经济、文化潜力满足自己的帝国野心,宣言“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佩列亚斯拉夫神话。^③鉴于俄乌两国有着数百年的共同历史,独立后的乌克兰在拒绝佩列亚斯拉夫神话的同时,并不排斥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但同时,乌克兰人民也会努力维护本国的独立地位、自主权利。当代乌克兰政治家应从遥远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权及贯彻执行的机制,邀请政治精英参与国家建设,统一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思想,实施合理的社会政策,避免各利益团体依靠外部势力互相斗争,防止冲突不断升级。对于乌克兰人民来说,赫梅利尼茨基的形象永远铭刻于记忆深处,这位盖特曼不仅是远古基辅罗斯的继承人,而且是漫长且艰辛的建国道路上的英雄主义者。^④

2004年,乌克兰总统顾问、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阿纳托利·加利钦斯基、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谢尔盖·兹季奥鲁克合作发表《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乌克兰人民的历史教训》一文,认为必须从当代视角深入、公正、科学地分析历史事件,在当代社会政治进程的背景下研究那些历史问题。乌克兰人民在重新思考本国历史的同时,必须实现社会和谐、克服刻板印象,更加细致地探究自我、认识自我,了解自我价值。17世纪中叶,统一的民族国家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初步形成。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是当时欧洲政治、社会发展新进程的一部分。1648年爆发的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在哥萨克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阿纳托利·加利钦斯基等人在文中详细分析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缔结缘由及相关国际法内容,论述了俄国如何开启扩张之门、莫斯科施行了哪些帝国政策、乌克兰人民为何丧失民族特征,最后总结道,乌克兰恢复独立主权后,民族—国家的重新构建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是17—20世纪

① Ю. А. Мищик, О. Г. Бажан, В. С. Власо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Київ: видавничий дім «Киево-Могилянська академія», 2008, с. 152 – 171.

② Ю. А. Мищик, О. Г. Бажан, В. С. Власо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Київ: видавничий дім «Киево-Могилянська академія», 2008, с. 177 – 186.

③ В. А. Смолій, Ще раз про Богдана Хмельницького. Переяславську угоду та уроки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ська козацька держава: витоки та шляхи історичного розвитку (Матеріали Шостих 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их історичних читань)*. книга 1, Київ-Черкаси: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У, 1996, с. 3 – 6.

④ В. А. Смолій, Ще раз про Богдана Хмельницького. Переяславську угоду та уроки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ська козацька держава: витоки та шляхи історичного розвитку (Матеріали Шостих 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их історичних читань)*. книга 1, Київ-Черкаси: Інститут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НУ, 1996, с. 10 – 12.

俄国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政策造成的。俄乌两国作为相邻的主权国家,其人民拥有相似的历史命运,因长期共同的历史团结在一起。成功建设一个民主的俄罗斯是乌克兰民主化的必要前提之一,将有助于乌克兰实现欧洲一体化这一决定性的发展战略。佩列亚斯拉夫拉达会议的悲剧性后果不应被当作社会反俄情绪的理由。然而,历史教训表明,适宜的政治、经济政策比任何“兄弟情”都更加可靠。过去的五六百年的历史一再证实,乌克兰在中东欧地区甚至欧洲大陆都起到关键性作用,确保了波兰立陶宛联邦、俄国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乌克兰应当仅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充分利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优势,巩固国家主权、加强国家认同,将乌克兰从受外部影响的客体地位转变为现代国际政治的平等主体。^①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俄乌关系持续恶化。政治方面,波罗申科政府宣布废除1997年签署的《乌俄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宗教方面,基辅都主教区脱离莫斯科牧首区长达三百余年的管辖,乌克兰东正教会正式宣布成立自主教会;军事方面,俄乌两国围绕顿巴斯、刻赤海峡剑拔弩张、冲突频发;文化方面,泽连斯基政府出台《确保乌克兰语作为国家语言功能的法律》,在各领域强制普及和使用乌克兰语。近年来,乌克兰全面倒向欧盟和北约,其议会法案将俄罗斯称为“侵略国”。瓦列里·斯莫利等学者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关于乌克兰国家发展的建议及愿景似乎与现实政治背道而驰。乌克兰精英阶层不仅未能成功整合不同区域的社会思想,反而利用纪念碑、纪念日等记忆手段影响民众的历史意识,为摆脱俄罗斯、融入欧洲提供文化认同。

2017年10月,基辅州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市议会经投票表决,决定恢复该市旧称佩列亚斯拉夫。早在1943年10月,为了纪念“俄乌人民结盟的奠基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将佩列亚斯拉夫市更名为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市。时隔七十余年后,乌克兰国家记忆研究所^②支持该市议会恢复旧称的决定。提议发起人之一、历史学副博士塔拉斯·纳盖科认为,“在当前俄乌关系的背景下,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和地方社区层面摒弃所有苏联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③。国家记忆研究所副所长弗拉基米尔·季利夏克评价道“赫梅利尼茨基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他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奥斯曼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均缔结有联盟协议,与俄国的协议只是其中之一。”“应该从最高成就而不是所犯错误来评判历史人物。赫梅利尼茨基创建了乌克兰‘哥萨克统领国’,为20世纪及当代的解放斗争奠定了基础。”^④因此,这位盖特曼依然伫立于现代乌克兰的万神殿之中。

通过分析“ЛІКБЕЗ. 历史战线”^⑤、乌克兰国家记忆研究所官方网站发布的文章、评论、视频可知,当代乌克兰学界主要从四个方面构建起民族集体记忆的宏观叙事体系。一是作为“受害者”。自基辅罗斯至今,乌克兰在各个历史阶段均遭受迫害,侵略者的角色通常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斯大林政权、苏联扮演,有时也由克里米亚汗国、波兰立陶宛联邦、纳粹德国扮

① А. С. Гальчинский, С. И. Здиорук и др., Переяслав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1654 год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уроки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https://day.kyiv.ua/ru/article/istoriya-i-ya/pereyaslavskoe-soglasenie-1654-goda-istoricheskie-uroki-dlya-ukrainskogo>

② 根据2005年7月乌克兰总统令,乌克兰国家记忆研究所于2006年5月成立,隶属于乌克兰文化和信息政策部,旨在恢复、保存乌克兰人民的民族记忆。

③ Хмельницького гонят із Переяслава за “совєтське прошле”: що делати з пам’яттю о знаменитом гетьмане? <https://kr.ua/politics/590705-khmelnytskoho-honiat-iz-pereiaslava-za-sovetskoie-proshloe-chto-delat-s-pamiatui-o-znamenitom-hetmane>

④ Хмельницького гонят із Переяслава за “совєтське прошле”: що делати з пам’яттю о знаменитом гетьмане? <https://kr.ua/politics/590705-khmelnytskoho-honiat-iz-pereiaslava-za-sovetskoie-proshloe-chto-delat-s-pamiatui-o-znamenitom-hetmane>

⑤ “ЛІКБЕЗ. 历史战线”是一个公共教育项目,设立于2014年,汇集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乌克兰历史研究所及基辅国立大学、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等高校历史系的专家学者,旨在普及乌克兰历史。

演。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的角色定位经历了一个转变,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中的“虚假盟友”变为纯粹追求自身利益的“侵略者”。二是作为“独立的特殊国家”。乌克兰拥有悠久的历史,延续了扎波罗热哥萨克追求自由民主的传统,是基辅罗斯遗产的合法继承者。乌克兰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体现在与俄罗斯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在赫梅利尼茨基的领导下,乌克兰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单一制国家,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参与者,拥有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在内的可靠盟友。三是作为“英雄战士”。乌克兰常常被具象成一位勇敢捍卫国家独立和完整的英雄战士。乌克兰学者特别强调起义过程中的全民支持、民族团结、目标一致,赋予所有民族英雄以乌克兰人民的整体特质,认为英雄们即使处于劣势,仍无所畏惧地奋起反抗,不仅捍卫自身权益,也为了遭受压迫的广大民众,虽然起义并不总是以胜利告终,但却代表着新的未来。四是作为“欧洲的一部分”。乌克兰自视为欧洲的一分子、欧洲进程重要且平等的参与者、欧洲民主价值观的承载者,甚至是欧洲的捍卫者、反俄的桥头堡。而欧洲则化身为一位善良高尚、准备接纳乌克兰加入的仁慈盟友。这种历史解释有助于乌克兰全面倒向欧洲的合理化。^①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正是在这一大的叙事框架下被重新改写。

五、结 语

1648年,扎波罗热盖特曼统一了第聂伯河两岸的乌克兰土地,建立了哥萨克自治政权,对“乌克兰”一词^②演变成民族称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赫梅利尼茨基起义被冠以“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乌克兰民族革命”之名,得到了不同时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学者的高度关注。关于该事件的历史书写反映了乌克兰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也涉及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发展,为了解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提供一个新视角。

19世纪,在沙皇专制统治下,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乌克兰知识精英从不同角度书写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不同记忆,意在论证乌克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唤醒长久处于桎梏下的乌克兰“民族精神”,为乌克兰民族自决提供理论和舆论基础。^③不同于帝俄官方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论”,泛斯拉夫主义者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着力推崇乌克兰哥萨克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塔拉斯·舍甫琴科强烈谴责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乌克兰自治主义者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则指出,赫梅利尼茨基是一位谋求“乌克兰自治”的先行者。

关于“博格丹派”和“马泽帕派”的争论是乌克兰民族独立意识与俄罗斯帝国思维碰撞的结果。苏联继承沙皇俄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论”,大力宣扬俄乌两大兄弟民族重新合并的历史必然。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大体上延续了苏联时期的官方阐述,重申俄乌合并是当时哥萨克政权最有利的选择,对乌克兰地区乃至东斯拉夫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然而,为构建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历史学家在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指导下,重新建构起17世纪乌克兰民族革命的历史记忆,赋予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丰富的民族革命内涵。他们认为,“《兹博罗夫协定》是首份正式承认‘乌克兰哥萨克国’独立地位的法律文件”^④。赫梅利尼茨基“首次获得波兰立陶宛国王对

^① A. A. Нечаева, “Нарративные макроструктуры в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памяти Украины”, *Социолог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vol. 4, 2020.

^② “乌克兰”一词作为地域名称,最早见于罗斯文献《伊帕季耶夫编年史》,原指“遥远之地”“边界之地”。

^③ 葛汉文、丁艳凤《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演进、政治诉求与极端发展》,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3期。

^④ І. Я. Терлюк, *Історія держави та права України*, К.: Атіка, 2011, с. 32.

乌克兰国家自治权的认可”^①。这场乌克兰民族革命旨在捍卫“哥萨克统领国”的独立地位。

近年来,俄乌关系急剧恶化,两国甚至爆发战争,“去俄罗斯化”成为乌克兰历史政策的核心思想,莫斯科政府从佩列亚斯拉夫拉达会议的“虚假盟友”过渡为逐步摧毁“哥萨克统领国”、纯粹追求自身利益的“侵略者”。这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国际政治因素。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乌克兰学界拓宽了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研究范围,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地探讨。但乌克兰政治精英并未从该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基辅政府对历史记忆的干预导致历史书写高度“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事实。乌克兰学者更加强调赫梅利尼茨基起义过程中哥萨克自治政权的国家建设、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意义、同瑞典等欧洲国家的结盟、与 17 世纪欧洲革命的相似等,继承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认为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早已定居于黑海北岸的森林、草原地带,特别突出乌克兰民族文化中的基辅罗斯遗产、哥萨克的民主自由、西乌克兰的拉丁化。这反映了当代乌克兰史学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乌克兰社会“脱俄入欧”的主流趋势。

Abstract In 1648, Bohdan Khmelnytsky launched a Cossack uprising against the Polish aristocratic feudal lords and established a Cossack autonomous regime in Ukraine on both sides of the Dnieper River. This is a watershed event in the long course of Ukrainian history and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Ukrainian and Russian scholars in different periods. During the period of Imperial Russia, Pan-Slavists, Ukrainian nationalists, Russian nationalists and Ukraine autonomists wrote different memories of the uprising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s, which reflected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Ukrain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consciousness and the Russian imperial thinking.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the Khmelnytsky Uprising was described as “the Ukra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War from 1648 to 1654”, and the government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two brotherly people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Russian historians largely continued the Soviet-era official narrative, emphasizing that Khmelnytsky chose a path of union with Russia.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Ukrainian historians reconstructe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Ukrainian na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and endowed the Khmelnytsky Uprising with rich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revolu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has deteriorated sharply, an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even gone to war with each other, with “de-Russification” becoming the core idea of Ukraine’s historical policy. As a result, the writing about the Khmelnytsky Uprising in Ukraine is inevitably mixe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actors, putting more emphasis on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by the Cossack autonomous regime, the significance of independent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alliance with Sweden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ts similarity with the European revolu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reflects the strong nationalist tendency of the contemporary Ukraine and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leaving Russia and joining Europe” of the Ukrainian society.

(桂欣, 博士研究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系, 北京, 102488)

(责任编辑: 黄凌翹)

^① В. С. Степанков, “Богдан Хмельницький і проблеми державності України”, *Український історичний журнал*, vol. 9, 1991.